

吐谷浑 花袖袖 存在主义

桑吉仁谦（土族）

概念的基本内涵

吐谷浑，这是历史上鲜卑族大首领慕容涉归之子的名字，无疑是个古名。吐谷浑是什么意思？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认为是个河的名字；我国学者方壮猷说，吐谷浑是蒙古语“尘土”的意思；吐谷浑史专家周伟洲先生依白鸟库吉之谈；而王民信先生《吐谷浑试释》中认为，吐谷浑是“啄木鸟”和“阴”之意。史家无论怎样解释、考证，总也不能确定其义，臆猜的成分颇浓。其实，只要懂土族语的人一点就会明白，吐谷浑是土语“targhun”的音译，亦即“肥”或“肥沃”之意。吐谷浑的弟弟叫“若洛魔”，实际就是他们依赖的那条河的名字，就是“饶乐水”（亦称“作乐水”），这一点白鸟库吉似乎说对了。吐谷浑与若洛魔这对兄弟很有意思：哥的名字为“肥沃”，“肥沃”是个抽象的虚名，但象征义很好；弟弟的名字是具体的河名，“饶乐”在今天的土族语中大概是“圣水”或“药水”之意，这个名字是实物。兄弟俩的名字一虚一实，其实他们的身份也是一虚一实，两人的命运是：得实名的继承了大业，得虚名的离开故土，远走他乡，重新铺就一条名副其实的发展

道路。

“花袖袖”，这是土族妇女穿的一种衣服的名字。《大通县志》上说：土族妇女戴帽，辫发用红棉绳贯青铜钱，垂于脑后，耳缀大环，银铜不一，足穿腰袜，衣服不论绸布，杂以五彩，束之大带。“花袖袖”指的就是“杂以五彩”的长袍。土族群众中较普遍的说法认为，“花袖袖”是按照彩虹的色调设计的，分别用墨、绿、黄、白、蓝、橙、紫七色彩布或绸缎缝制的，也有一种说是红、黄、绿、紫、蓝五种彩布缝制成的。无论有几说，“花袖袖”是参照彩虹的颜色搭配缝制成的，这一点似乎没有异议，所以把今天土族生活的地方称为“彩虹的故乡”。

关于“花袖袖”的“五彩”或“七彩”的说法，并非随意地将彩虹拉来，按彩虹的颜色缝制成土族妇女“花袖袖”的，在民间有一个关于“花袖袖”的传说故事，名叫《贪婪的弟弟》。故事说，从前有个好吃懒做的弟弟和忠厚勤奋的哥哥，俩人都没媳妇。父亲临终时安排，兄弟俩一定要和睦相处，相互照顾，家产也要平均分配。父亲死后，弟弟占有了哥哥的财产，并把哥哥撵到荒野里去。哥哥就靠一小块地种青稞为生。有一年，地里长

出树一样高的一棵青稞，一只神鸟落到枝上，把枝子给压折了。哥哥见此情景就给神鸟哭诉，神鸟很感动，就给他衔了一大堆黄金珠宝，让他开荒养畜，过上好日子。哥哥如此做了，日子渐渐好起来。有一年夏天，见一条彩虹落在他的地里，不久那彩虹变成一朵红牡丹。他喜爱至极，拿到家里养起来。有一天他劳动回来，不见了红牡丹，紧张地喊叫起来，结果厨房里答应道：我在这儿呢！哥哥走进厨房一看，一个漂亮如天仙的姑娘，穿着七彩的“花袖袖”衣服，正给他做饭呢。他们成了亲，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而他的弟弟却成了乞丐。这个故事传达了一种信念：勤劳可致富，好人终有好报。这种思想也正是广大的土族人民普遍向往的。从这个角度说，“花袖袖”的传说故事也有它一定的历史伦理价值。

存在主义，这是个哲学的名词，或者说是西方现代的一个哲学流派。它的哲学主张似乎不太统一，各代表人物都有各自的观点和主张。较著名的有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法国哲学家萨特、马塞尔等。存在主义可以是一个流派，也可以说它只是个哲学的方式，它的思想驳杂，观点各异。不过，本文看重其中的一对基本概念，它们是“自在”和“自为”。本文无意在这种深奥的哲学概念上兜圈子，也无意用西方文化观念来诠释东方文化精神，本文只想借用“自在”和“自为”这对哲学的概念，恰如其分地说明土族人与相应的文化观念之间的关系。

“花袖袖”中的本体论

有一首说唱“土族花袖袖”的歌词，

这样唱：阿依姐的花袖袖好奇妙 / 为什么还有七道花边边 / 莫不是把彩虹剪下来 / 莫非是将凤凰尾巴缀两臂？问了这样几句，接着答道：阿依姐的花袖袖哟 / 不是天上彩虹耀人眼 / 不是凤凰的尾巴显华丽 / 它是宇宙的妙用撒人间。这首说唱“花袖袖”的歌似乎比较接近“花袖袖”的本义了，遗憾的只是它仍有保留，没有把这“妙用”给点破，没有给它一个明确的意义。

那么我们不妨追问：“它是宇宙的妙用”，究竟“妙”在何处？

首先，我们从土族“花袖袖”的颜色要素来做些分析。我们知道，对世界本源或本体的探究是哲学这门学科的一大特点。在古希腊哲学中，有亚力士多德的“万物的本源是水”之说；艾修斯的“万物的本源是无限者”之说；辛普里求的“无限者气”说；弟欧根尼·拉尔修的“一是万物的本源”说；赫拉克里特的“气、水、土、火”四元素说等。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太虚”“太极”说、“阴阳”说，特别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的“相生相克”学说等。无论中国古典哲学还是西方古代哲学，在寻求世界本源问题上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找到构成世界万物的恒长不变的基本物质元素，金、木、水、火、土、气、一、无、无限等。土族妇女“花袖袖”上的七种颜色，也不是看见彩虹而随意设计出来的，“七色”同样具有本体论内涵。比如“墨”代表土地；“绿”代表一切绿色植物；“黄”代表农业的成熟；“蓝”代表水或海洋；“橙”代表温暖的光明；“白”代表白云或气体；“红”代表太阳。七种颜色赋予世界两层寓意：一方面，它们是我们人类

感知和生存的构成宇宙、自然界、大世界的要素，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色，这个世界就会失去光彩，甚至就不可能是我们现在感知的这样一个世界；另一方面，这七种颜色是生命之所以存在的根据和理由，可以说它们就是生命之色，不具备这七种颜色，生命同样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富有光彩。从这七种颜色的排序来看，墨、绿、黄、蓝都在地上或地本身，白、橙、红都在虚空中。七种颜色从地上一直到空中，它们既是自然色的代表，又是生命的必需。所以，我们把土族这种以自然色做为生命和生活依据的“颜色文化”，不妨称之为有关生命、生存和生活的本体文化。

其次，生命生存的颜色依据只是一个方面，把这些颜色着于何处，用什么方式令它和自然一样长久，这又是土族“颜色文化”的另一层意思。毫无疑问，凡颜色都蕴藏在物体的质地中，颜色区别物体，影响物体，同时也是美学的基本元素。土族的先祖们把自然界的这种颜色从物体中提取，然后组合成一种观念形态的服饰文化，穿着到年轻妇女身上。这个过程，从今天的视角审视，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女性本身就需要艳丽、漂亮，女性的体形面貌也具备审美的优越条件。可是在古代，让女性打扮漂亮不仅仅是审美的需要，更重要的是生育和存在的需要。举例来说，文中的“地”，就具备这种功能。《说文·土部》中说：“地，元气初分，轻清阳为天，重浊阴为地，万物所陈列也。从土，也声”。《说文·一部》又说：“也。女阴也”。就是说，天性轻清而阳，地性重浊而阴，天地这对矛盾，一若人间之男女，女可以生儿育女，土地也可以养育万

物。所以，人间才有了地母崇拜和女神崇拜。春秋时代的老子，对这一点说得再明白不过。他在《道德经》第六章中说：“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①其中的“玄”，就是象征深远而看不见的万物的生殖器，或称之为自然的生殖器。老子认为，自然万物生生不息，而能使自然“生生不息”的就是像女性一样生育万物的“玄牝之门”。在古人的这种认识观念指导下，我们再审视土族人“颜色文化”以及把这种“颜色文化”毫不保留地赋予女性的用意，我们就会发现所谓的“宇宙的妙用”。土族妇女身着的“花袖袖”有七种颜色，这七种颜色所代表的自然要素，如同金、木、水、火、土、气一样，同时也是生命的必需，任何生命若离开它们中的任何一种都无法生存，而土族的先民们把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这种颜色给予产生生命的母体，用服饰文化的方式还原给生命的本源，这就赋予这种独特的“颜色文化”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它可满足女性审美的需求，另一方面更能增强女性生育的能力，从而促进民族的强大和繁荣。

再次，这种颜色的综合功能，若借用土族先祖吐谷浑的名字形容，它的象征是“肥沃”。黑色的土地是肥沃的基础，绿色的植物世界和黄色的收获是肥沃带来的结果；而蓝色的水、白色的云气、橙色的温度和红色的阳光，是与肥沃相结合而带来丰收的必需条件。没有后四样条件，黑色土地的肥沃就失去了意义，黄色的肥沃之结果也就无从产生。从土族妇女身上的“颜色文化”和土族先祖特殊的名字寓意中我们知道，土族所有文化都包含在有声的日常语言和无声的物质文明中，吐谷浑

等人名是一例，土族妇女身着的“颜色文化”更是典型的证明。

作为存在的“花袖袖”

马克思主义存在观认为，“存在决定意识”，就是说，存在在前，意识在后，有什么样的存在就决定着什么样的意识。萨特提出的存在主义名言“存在先于本质”^⑫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存在决定意识”的翻版，认为存在是先于本质而存在的，本质却是存在者自由选择的结果。在这里，本文无意探讨马克思主义存在观和存在主义哲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提出“存在”这一重要概念的目的还在于借此探讨土族妇女身着的“花袖袖”与存在之间的关系，存在与这个古代民族生活之间的关系。

如上所述，土族妇女身着的“花袖袖”是由七种自然色组成，而这七种自然色首先是一种客观存在，按存在主义的话说，就是一种“自在”，土族的远古祖先们在认识这种“自在”的长期活动中，选择了七种“自在”的本质，同时把这些“自在”的要素，变成本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化，变成妇女们身上的衣着，这个过程本身既是人类文明必然要有的“自在”过程，也是将“自在”的本体生活化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蕴藏着土族人民的聪明智慧和选择本民族至高生活理想的价值和意义。

再从民族发展的角度考察。一方面，这种选择充分体现了土族先民强烈的生存意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还是达尔文的物种进化论，都提出一个真理性观念，任何物种最根本的存在方式首先

是生存。生存第一。有了生命的生存这一存在形态，才能谈得上生活、发展、繁荣以及更高形态上的精神追求，这是任何生命和生命的种类都不可避免的。土族的先民们生活在古代的北方，北方代表中国的游牧文化。据有关科学考证，在古代，北方的气候并不宜人，长期的干旱和草原的沙化非常严重，湿地不多，而沙漠化进程和沙漠对草原的侵吞从未停止过。正因为北方草原这种严酷的气候条件，迫使北方的游牧民族逐步地南迁和西进。西晋时期，慕容部的吐谷浑西迁，史籍中说是由于“两部马斗”伤了双方的和气才西迁的，其实，“马斗”的直接原因就是生存资源的进一步恶化和短缺所致。所以，土族先民们长期生活在这样严酷的自然环境中，他们首先考虑的应该是部族如何生存下来的问题。在自然界中，决定生存的因素很多，但哪些因素是最主要的、最具决定性的，这就有个“选择”的问题。如上所述，土族的先民们选择了自然界的七种颜色，以此作为部族生存的基本条件。为了把这种选择和生态的基本观念贯穿到部族发展的始终，先民们又将这生存和生命必需的七种色素转换为生活中的日常要素，使所有部族的人们时刻都看见它，记着它，这大概就是土族妇女身着“花袖袖”的另一种原初的意义。

土族妇女的“花袖袖”也体现了土族先民们顽强而务实的生活观。生活是人类活动的一种常态现象，如何树立一种正确的生活观，这对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土族的先民们选择了七种自然的颜色作为生活来源的依赖，这是一种非常务实的生活观。颜色代表自然的要素，颜色也代表生活的理想，黑油油的

土地、绿茵茵的原野、黄灿灿的麦浪，这是一组高度逻辑化的画面组合，诗一样的田园景象，令人感到无比舒畅的生活境界，陶渊明毕生的追求不过也就是这样的一种境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田园牧歌”和“耕读传家”的生活理想不过也就是这些内容。除了这三种颜色代表的极具现实意义的生活理想之外，还有蓝色的河流和湖水，白色的云彩和空气，橙红色的温暖和红色的光明，这四种颜色的组合，又将现实的生活理想提升到广阔无垠的空间和无限之中，使人类的具体生活超越具体，达到一种无限宽广、无限美好的永恒层面上，使人超越人自身，使部族超越部族的狭隘和有限，使物质超越有限空间，从而开拓出民族独有的一种精神空间，凝聚成一种民族生活的精神力量。任何一个民族都具有这种从具体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的追求过程，而且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追求方式，土族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自然也不例外。

第三，在土族妇女“花袖袖”中凝聚着这个古老民族至高无上的价值观。价值观是一种至高的精神追求，每个民族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属于本民族的独一无二的价值观。土族人的价值观当然不仅限于“花袖袖”一物之上，它体现在土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土族妇女的“花袖袖”最具典型意义，或者说最具代表性。自然的七种颜色是一种客观存在或者“自在”，人处在其中必然与这种“自在”发生某种关系，土族的先民们为自己的民族选择的即是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比如人自身就是一种“自在”的客观存在，它在生存和生活的过程中必然有“自为”行为，这种行为的对象就是“自在”，这本

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组合；而土族人把“自在”的要素生活化，变成妇女的服饰，这个“自为”过程本身就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和谐。至此，我们再不难理解，土族人至今为什么还要祭田地、祭山川、祭河祭湖水、祭天祭神灵，祭祀的背后深藏着土族人民自古至今形成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而这种价值的直接表现形式就是无言的“花袖袖”，它既是一种服饰文化，同时又是一种象征，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观。

参考文献及注释：

(日)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地学杂志》1934年第22期。1935年第24期。冯家升译。

《鲜卑语言考》方壮猷，《北京学报》1930第8期。

《吐谷浑史入门》周伟洲著，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

转引自《土族简史》，《土族简史》编写组，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穿彩虹花袖衫的人》，李友楼著，青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说唱：土族的花袖袖》，载于《甘肃日报》，祁全生搜集整理。

以上古希腊哲学引言，均出自《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中国古典哲学诸引言，均出自《周易人生哲理博览》，宋文安、张文郁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转引自《说文解字》。

⑪《道德经·百喻经俗译》，刘彦灯、范文琪译著，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⑫《西方现代哲学》刘放桐等编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版。